



9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领导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举行起义，这就是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创造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数个第一，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开端、中国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 李 涛

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的诞生

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的指示精神，起义部队仍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打出的也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前往湖南传达会议精神，并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坚决主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工农，丧失了民心，成为白色恐怖的象征，因此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共产党自己的名义领导人民

革命。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9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把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革命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同时，起义部队使用了一面自己设计的旗帜。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它的设计者是时任第一师师部参谋、曾经留法勤工俭学的何长工，以及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

因为没有现成的样子，三人经过反复研究，模仿苏联红军的式样，设计出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工农革命军军旗。旗幅为红色，象征革命；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星内嵌有交叉的黑色镰刀、斧头，象征工农大众紧密团结；靠旗杆一侧旗幅缝有白布条，上面用

繁体字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

许多年后，何长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紧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十分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官兵在军旗的引导下，奋勇前进的雄姿。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第一次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

9月9日，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分头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秋收起义就此爆发。

参加起义的部队共编为3个团，目标是夺取长沙。但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而起义部队主力只有5000余人，且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因此夺取敌人重兵驻守的中心城市长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很快，起义部队就遭受严重挫折，锐减至1500余人。危急关头，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战斗，退到浏阳东乡文家市集结。

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沿罗霄山脉南移，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建制上虽然还有两个团，但人员已不足千人。由于当时部队基层尚未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党对基层部队的控制力不强。同时受旧军队雇佣思想和军阀主义作风的影响，使官兵关系遭到损害，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和斗争环境艰苦，部队减员严重，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内部出现了混乱和动摇，就连一些指挥员也感到不知所措。

失败的情绪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逃跑的人越来越多。赖毅回忆：“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毛泽东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想走的可以，你报个名，打个招呼，把枪留下，给你发路费，今后好见面。以后你要再革命，再跟上队伍，但你要记住，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改编的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缩编建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同时加强思想工作，克服错误思想倾向，资遣不愿留队的人员。

二是健全共产党组织，设立党代表。由原来在团以上单位建立党组织改为在班、排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实行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的制度，规定凡属重要问题都要经营、团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从组织领导体制上确立并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是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新型官兵关系。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在团、营、连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管理，以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参加会议的罗荣桓曾回忆：“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三湾改编首次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是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开端，同时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初步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后来在写给中央的信中称：“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入党誓词中第一次加入“永不叛党”

三湾改编后，起义部队尽管人数有所减少，但组织更加精干，思想政治工作也加强了，官兵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0月15日，在湖南酃县水口街叶家祠堂的阁楼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部队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新党员入党仪式，并给陈士渠、赖毅、刘炎、李恒、欧阳健和鄯辉6名新党员

逐条讲解入党誓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入党誓词中第一次加入了“永不叛党”四个字，这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已不再是一次普通的入党仪式，而是在播撒理想信念的火种。

陈士渠曾回忆：“在酃县水口，根据毛泽东的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的指示，我和一些骨干分子也加入了党组织。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入党仪式，带领党员宣誓，并讲了党课。这是我在革命生涯中的巨大转变，也使我从此有了新的政治生命，当时我心情十分激动。坚决革命，服从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成为我终身的奋斗目标。”

水口入党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要求各连党代表都要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并照这个样子组织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

22日，部队进驻遂川县大汾。当晚，特务连举行了第一次入党宣誓仪式。时任特务连副连长的张宗逊回忆道：“屋里的气氛很庄严，桌子上点了一盏小煤油灯，光线虽然不很亮，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墙上挂着一面党旗，这是一小块红布，上面临时写上‘CCP’三个大英文字母。毛委员亲自主持入党仪式，他先向大家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义。”随后，党员们都站起身来，面对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手，随着毛泽东逐句诵读誓词。

水口、大汾发展的新党员，是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正是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才开始落到实处。

“鸡鸣三省”会议的历史功绩及启示

□ 许先春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第一，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四项决议，其中第一项“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第四项“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当时在会议上就已经得到解决。而第二项“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项“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在敌人围追堵截、战情紧迫的情况下，只能留待会后在适当的时机去完成。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军事指挥是党中央最重要的工作。“鸡鸣三省”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提出的常委分工问题，毛泽东进入军事决策核心层，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其军事指挥地位得到明确。

第二，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部署红军战略转移。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目的是要实现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争取四川赤化”的原定目标。进入川南地区以后，红一军团二师围攻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各路敌军陆续向叙永合围，加之川军主力集结川南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红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了敌部署，决定由准备北渡长江转而挥师西折，向云南扎西前进。这是红军四渡赤水水中具体改变战略方向的开始，体现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灵活机动的军事原则和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经过这样的战略调整之后，红军到达云南扎西并召开了会议。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确保党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转变达成共识。遵义会议最后一个没有

完成的任务——通过会议决议并传达，至此已经完成。

第三，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的项英先后三次急电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动方针并“立复”。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以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指示中央分局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强调“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鸡鸣三省”会议根据中央苏区已经变化了的斗争形势，改变了以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为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更好地坚持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不仅摆脱了苏区与国民党军事斗争的不利局面，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

“鸡鸣三省”会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中的重要一环，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推选中央领导人，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进一步走向成熟；进一步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讨论和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分工问题，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进一步贯彻。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可以说，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

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鸡鸣三省”会议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节点。正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非凡的军事才能，对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转危为安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鸡鸣三省”会议是推动形成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一次重要会议。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事实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 and 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却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在于我们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毛泽东高瞻远瞩、谦诚果敢，周恩来对党忠诚、大公无私，朱德仁慈宽厚、豁达大度，张闻天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博古顾全大局、襟怀坦荡，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高风亮节。毛泽东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众望所归，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实践中、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形势下逐步形成的。经过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洗礼，历经各种挫折和失败，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对于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党的核心意识逐渐萌芽。而从遵义会议开始，经过“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直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逐渐确立，为全党所公认。党的核心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日渐培育、得到增强。这其中，“鸡鸣三省”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加快构建容错纠错机制

□ 王高萍 朱一华

明确敢作为和乱作为之间的界限，坚决惩治借改革创新之名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或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以及侵害群众利益等行为。

必须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容错纠错机制，必须按照法治体系的思维框架，明确容错纠错机制由谁来建构、由谁来认定、由谁来实施和监督。从地方探索情况看，省级政府或地方政府是容错纠错机制建构的主体，担负着确定容错范围和具体操作程序的职责；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则是实施主体，担负着执纪问责的职能。规范并遵守容错纠错认定程序是保障容错纠错机制正确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制定科学化的机制，不断健全容错认定的具体操作流程，强化程序保障。

必须确保机制运行公开化。在法治社会，政府公权力应该在阳光下运行。因此，要使容错纠错机制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公开容错纠错过程，主动接受各方监督。第一，容错纠错机制制定过程要公开，尤其是针对容错范围的确立，要广泛征求各方的合理化建议，充分论证，确保机制内容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第二，容错纠错机制运行过程要公开。机制正式启动后，该公开的信息要公开，促使各方评价机制更加客观地对待改革创新者出现的失误或错误，依法用权、秉公用权，使其作出的评价更加公正、合理。第三，容错纠错实施结果要公开。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政府须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容错纠错机制申请人、单位的相关信息，妥善引导舆论，保障制度的公信力，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必须确保强有力的保障机制。要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效的保障机制十分重要。容错纠错机制一旦从制度层面建构起来，相关保障机制也要同步跟进，相关部门更要增强政治勇气，敢于为担当者担当。纪检监察机关对于申请容错纠错机制的干部要认真调查、科学分析，对确属容错范围的务必启动容错纠错

程序，同时，不管是组织人事部门，还是干部所在单位，都要增强担当意识。对于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干部，应积极鼓励，并提供必要和足够的保障机制。如果干部因大胆探索，经验不足犯了错，则应启动容错免责程序，符合免责条件，所在单位仍应继续委以重任，鼓励其“戴罪立功”。当然，在机制上，还应确保干部在今后的绩效考核、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等方面不受不利影响，真正免去干部的后顾之忧。